

兩岸在國際競爭中實現競爭互補、 提升競爭力的策略

彭錦鵬

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台灣與中國大陸於 2010 年 9 月 12 日簽署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使兩岸關係進入全新世代。台灣「黃金十年」號召與大陸「十二五計畫」遠景，在可見的未來將成為兩岸人民共同努力與合作之目標。面對 21 世紀全球化、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地球暖化、經濟情勢變動不已等全新局面，各國競爭態勢日趨激烈。在可見的未來，如何保持競爭力，營造不斷發展的永續社會，創造人民生活福祉，為兩岸政府與人民必須面對與充分準備之課題。

兩岸如何在國際競爭中實現競爭互補，不斷提升競爭力，不但牽涉兩岸政府與人民的投入，亦將成為全球政經舞台矚目的焦點。首先我們要檢視中國大陸在過去 30 年中的不斷蛻變和成就，並探討未來成長的挑戰和軌跡。

壹、中國的快速成長與現狀

1978 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向全世界開放的基本政策，並推動整體的經濟改革。1979 年至 2008 年間，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到 9.8%，比同期世界經濟平均發展速度快 6.8%。就經濟總量而言，1978 年，GDP 總量居世界第 11 位。2000 年，大陸 GDP 超過義大利，居世界第 6 位，是美國的 12.3%，日本的 25.7%，德國的 63.1%，英國的 83.1%，法國的 90.2%。2005 年，大陸 GDP 超過英國和法國，居世界第 4 位，是美國的 18.1%，比 2000 年提高 5.8%；是日本的 49.3%，接近一半，比 2000 年提高了近 1 倍；是德國的 80.5%，比 2000 年提高 17.4%。

2008 年，大陸 GDP 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 3 位，但已是位於世界第 2 位的日本的 78.6%，比 2005 年提高 29.3%。

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上第 2 大的經濟體，僅次於美國。1978 年以前，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緩慢，在採取市場經濟開放政策之後，經濟成長速度大幅提高，過去 30 年經濟成長率平均高達 10%（見圖 1），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第 2 大的進口國。中國大陸在 2011 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國。從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民所得而言，中國國民所得 2009 年為 6,890 美元，已是美國 45,640 美元的 15%。1980 年的平均國民所得只有美國的 2.04%，2010 年則已經成長到美國的 15.9%。就一個人口上是美國 4 倍以上的經濟體而言，大陸經濟發展能夠在 30 年之內，在人均所得上相較於美國而成長 8 倍，經濟改革的成效在人類歷史上，是一項輝煌的紀錄。從具體數據上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統計，1962 年大陸人均 GNI 只有 70 美元，到 1978 年也只達到 190 美元。但 1979 年改革開放後，人均 GNI 大幅提升。2001 年突破 1,000 美元，2008 年達到 2,770 美元，比 1962 年增長了 38.6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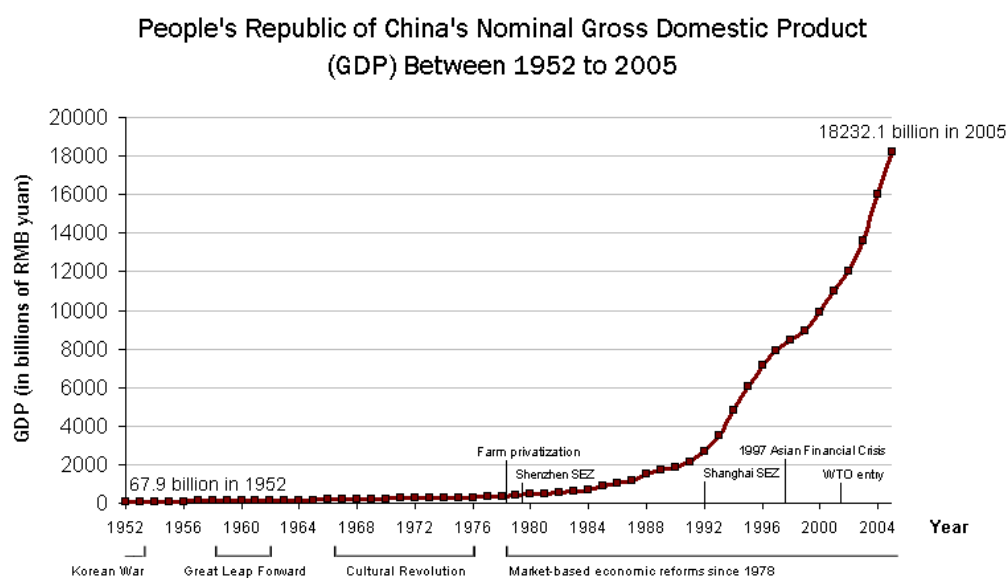


圖 1 中國經濟成長之國民所得總量趨勢圖

如果回顧主要的工農業產品生產量，大陸也都表現出高速的成長。鋼產量 1949 年居第 26 位，1978 年提升到第 5 位，2007 年進一步提升到第 1 位。煤產量 1949 年居第 9 位，1978 年提升到第 3 位，2007 年進一步提升到第 1 位。原油產量 1949 年居第 27 位，1978 年提升到第 8 位，2007 年進一步提升到第 5 位。發電量 1949 年居第 25 位，1978 年提升到第 7 位，2007 年進一步提升到第 2 位。化肥、水泥、布等產品產量飛速發展，目前均居世界第 1 位。

就農業產品而言，大陸生產的穀類、肉類、棉花、花生、油菜子、茶業、水果等等項目都是居世界第 1 名。

1978 年前的 29 年，中國基本上沒有外商直接投資。改革開放後的 30 年，中國投資環境不斷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逐年增加。1979 年中國 FDI 總量只有 8 萬美元，1980 年為 0.57 億美元，1990 年上升到 34.9 億美元，比 10 年前增長了 60 倍；2000 年進一步提高到 407.2 億美元，又比 10 年前增長了近 11 倍；2008 年中國的 FDI 達到了 924 億美元，比 2000 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 年至 2008 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 8,526.2 億美元，是發展中國家中吸引 FDI 最多的國家。

1952 年，大陸外匯儲備只有 8 萬美元，到 1978 年，也只有 16 億美元，只相當於當時世界第 1 位德國的 3.7%。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和綜合國力的增強，外匯儲備大幅增加。2006 年底突破萬億美元大關，達到 1 兆 663 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2011 年，大陸外匯儲備達到 2 兆 6,220 億美元，比第 2 位的日本 1 兆 1,355 億美元，超過 1 倍以上。

經濟飛速成長的情形，也同樣發生在社會的各層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把掃除青壯年文盲做為教育發展的重大任務。2000 年，中國實現了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教育目標，全國成人文盲率降至 9.1%，青壯年文盲率降至 4% 以下。2008 年，全國文盲率降

至 6.7%，整體人口教育素質得到基本的改善，有助於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發展。

其次，城市化的潮流快速成長。1979 年到 1991 年的十二年間，總共新增加城市 286 個，平均每年新增 15 個城市。到 2008 年底，全國城市總數達到 655 個，比 1991 年增加 176 個，增長 36.7%，城市化率提高到 45.68%。城市化的結果，各地交通四通八達，縱然在邊疆地區、各地山區，鐵公路的交通和基礎建設，已經大致到位，近年來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的快速成長，也使得東南半壁的大都市，透過高速鐵路的全面拓展，逐漸朝向在一天之中能夠抵達的交通範圍之內。大都會如北京、上海、廣州的建設與生活環境，在過去幾年中則透過奧運會、世界博覽會、亞洲運動會等國際活動而進行大規模的都市更新，提供 21 世紀的高品質、便利生活環境。

貳、中國世界競爭力的強項和弱項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0 國家競爭力藍皮書》指出，在其選取全球 100 個主要國家中，中國的國家綜合競爭力近 20 年實現跨越式上升，由 1990 年的全球 73 名，進步至 2008 年的 17 名。報告預期，中國將在 2020 年進入 G20 五強，2050 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 2 強國。

中國 30 年來改革開放的成果，就國際的比較而言，整體上處於競爭力穩定向上的趨勢。中國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的競爭力排名上，2010 年為第 27 名，處於效率驅動（efficiency-driven）的競爭力發展第二階段。透過 30 年的改革開放，人均所得已經達到 3,678 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民所得占全球總量的 12.52%。

在 WEF 調查的 139 國家和經濟體中，中國的市場規模排名第 2 名，總體經濟環境表現傑出，排名第 4 名，這兩項因素在所有評比項目中，顯然是最突出和重要的關鍵。相對而言，中國的創新排名為 26 名，也是相當突出的。其他項目的排名分別為：健康和初級教育第 37 名，勞動市場效率第 38 名，商業精緻第 41 名，貨品市場效率第 43 名，制度第 49 名，

基礎建設第 50 名，金融市場發展第 57 名，高等教育和訓練第 60 名，國際整備第 78 名。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所發布的 2011 年報告，中國的競爭力排名為第 19 名。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經濟的優勢有：全球排名第 1 的就業，排名第 4 的勞動力市場，排名第 6 的體制結構，排名第 7 的基礎設施、國際貿易，排名第 10 的科學基礎設施，排名 12 的公共財政、社會結構，排名 19 的生產效率，排名 20 的國際投資、設施。

相對而言，中國比較弱勢的項目主要是：排名 53 的環境和健康，排名 52 的公共財政，排名 47 的商業立法，排名 43 的教育，排名 37 的管理模式，排名 32 的商品價格，態度與價值觀方面排名 28。

深層來看，中國的快速發展已經引起全世界各國朝野人士關注的焦點，有人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的超級強權，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將進入高原期，或者進入無法持續的制度困境。

從 1978 年中國正式改革開始，30 年以來，是從計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的過程，就目前來看，這個轉化的過程從中國大陸全面城市化與製造業、服務業雙雙取得高度的發展而已經基本完成。同時中國透過中央集權而高度效率的規劃體系，將初期的地方工業化在很短的時間內陸續轉變為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承接國際性企業的代工製造，並逐步提高上游和中游產業的發展，這種經濟改革也是相當成功的。然而，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0 年的市場經濟發展下，無可避免地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而新的資產階級之消費能力在過去 10 年中大量爆發。全世界的精品、奢侈品廠商都全面受惠，營業額飛速成長。根據各方估計，在 10 年之內中國將成為世界第 1 名的奢侈品市場，而與各國奢侈品消費習慣不同的是，中國精品消費的受益人有很大的比率是透過送禮而獲得。

過去 30 年中國國際經濟競爭力的來源，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透過啟用大量的勞動力剩餘，開創低門檻的製造業和代工業，並且經由各地政府互相強力競爭提供租稅優惠、快速行政作為等方法和管道，而取得重大成就。然而，在通過「效率驅動」的經濟優勢之後，想要進入 WEF 所稱「創新驅動」的經濟環境，則整體相關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就需要更為全面的加以檢視。

首先，從經濟體制來看，由於中國的工會力量薄弱，勞動立法緩慢發展、不完善以及實施困難，尚無法對於資方形成必要的制約力量，其結果就是中國的工資遠不如資本家的利得受到保障。就發達國家而言，19 世紀以來，勞方透過不斷地工會運動爭取工人的權益，組成工會，形成團體的制約力量，但是在整個 20 世紀，特別是 20 世紀的末期，由於各種法律的訂定和修正，同時資方也瞭解到工會罷工所形成的破壞性力量，因此勞資關係逐漸轉變成為互相制衡、互相協調，甚至於勞方參與股權購買的互利關係。未來中國的勞資關係發展，並不需要一定經過工會抗議、抗爭的階段，而可以迎頭趕上，直接創造出制度性的勞資和諧關係。

國際間的普遍共識是，中國自 1979 年起的經濟成長表現令人驚嘆，但是沒有人能夠保證未來的經濟成長幅度仍然保持 5% 以上，同時維持相當長的時間。未來 20 年內，中國經濟成長幅度必然趨向緩慢，多項有利的結構性因素都將逐漸消失，如「人口紅利」（人口平均年齡低、勞動力人數龐大）、進軍全球市場幾無限制、高儲蓄率、環境成本低廉等。取而代之的是，在長期嚴格執行一胎化政策之下，目前社會人口結構正加速老化，至 2020 年時，全國 60 歲以上人口將達 17%。人口老化不但將增加醫療與退休成本，也將大減儲蓄及投資金額。

第二，就政治體制而言，發達國家普遍實行民主制度，而發展中國家則普遍存在君主制、個人獨裁、軍人政權、大選民主等多樣化的政治體制。由於憲政民主制度的普遍為世界各國所接受，同時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憲政

民主制度普遍相依相存，中國在共產黨主政之下，如何協調創造出兼具民主課責和效率的政治體制，顯然是未來創造永續發展競爭力的重要課題。

中國目前雖然維持共產黨執政的政治體制，但其基礎、結構和職能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共產黨執政的政府不再主張「共產」即公有制，而是以發展經濟為己任，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強調建立「和諧社會」。政府也不再直接組織生產，而是轉變職能，服務於市場，在競爭中充當「裁判員」，調和社會不同集團之間的對立和矛盾。（路愛國，《研究報告》No.2009-03，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雖然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國際注意力集中在第三世界國家，但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府則逐步接受了現存的世界秩序，熱衷於與世界「接軌」，遵循國際規則，積極參與各式各樣的國際組織，包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遵循國際經濟法制規範。另外一方面，中國政府也公開表示將成為「負責任的大國」，言外之意是中國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不負責任」，即不會做破壞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事情。

第三，就社會保障制度而言，發展中國家普遍呈現缺乏社會福利和保障的制度，對於生老病死的問題，只能夠採取放縱不管的態度。相對而言，發達國家則幾乎毫無例外的提供多元而複雜的社會福利制度，特別是健康保險制度以及國民年金制度，以照顧一般人民的健康和老年生活。然而，目前中國並不存在政府所主導、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制度只有人數較少、收入較高的少數人，能夠支付名目繁多的商業或私人保險。

根據研究指出，中國目前存在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已經極為明顯。第一，按照通用的基尼係數衡量，中國屬於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國家；第二，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驚人；第三，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甚至超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 2006》顯示，基尼係數低於中國的國家有 94 個，高於中國的國家只有 29 個。亞洲開發銀行研究發現，中國的貧富差距已位居亞洲第 2，超過了除尼泊爾之外所有亞洲國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結果顯示，在 2009 年「0.4%的中國人佔有 70%的財富」，依此推估中國在 2009 年的實際基尼係數應該大於

0.696，也就是超過聯合國定義的 0.4 的警戒值。改革近 30 年來，中國人均財富在世界排名仍在 100 多名，只不過是美國人均財富的 2%，但中國近年來的奢侈品消費卻高居世界第 2。這些數據顯示，中國貧富差距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已經達到必須檢討政治和經濟體制的修正，否則無法加以改善的地步。

回顧過去 30 年的經濟成長軌跡，中國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加入世界市場成為數一數二的「世界工廠」，不過，這種優勢正在受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挑戰，例如印度等人力充沛的國家。在價格競爭的割喉戰中，各國低科技的製造業相競爭的不是生產力、科技能力，而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超低工資為犧牲的競爭規則。這種惡性循環的國際競爭，對於中國勞方是非常不公平的現象，也無法凝聚或形成中國為「世界市場」的高品質社會。為了避免「有出口而無產業」的困境，未來的「十二五計畫」顯然將必須整合「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的發展方向。

中國固然存在體制上的根本問題，然而其高速發展也使得國際媒體焦點經常聚焦於未來可見的發展與國際實力。經濟學人週刊在 2011 年 6 月的中國專刊中，首先指出，在 10 年之內，中國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是中國正面臨「角色復出而改革不再」的威脅。經濟學人週刊認為，國營事業的力量再度復甦，對於市場經濟競爭和消費能力，將是很重大的打擊，同時也會使得社會緊張程度提高。但是無論如何，很多人早已將中國視為世界第二超級強權，甚至認為美國及中國所組成的「G2」，將必須一同處理世界各項最迫切的問題。

中國將在未來一、二十年中，成為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軍事大國，基本上已經成為國際間的共識。但中國社會成為超級強權，而具備做為超級強權的條件，則仍待觀察。回顧人類歷史，國際間的超級強權除了具有高科技的國防武力，尚保持科技的領先地位、經濟競爭力、國際社會的領導向心力、以及文化藝術的高度發展。面對 21 世紀國際環境的重大變遷，

中國是否將追求超級強權的地位，或是將擔當國際發展標準的制定者與仲裁者，成為「負責任的強權」，也需要更為深刻的檢討和努力。

參、台灣世界競爭力的強項和弱項

台灣的經濟發展從 1950 年代開始，就受到全世界各國的矚目，經濟學者羅斯托的「起飛模型 (Rostovian take-off model)」清楚描述台灣經濟成長的不同階段。羅斯托將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過程分為「傳統社會階段」、「準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走向成熟階段」、「大眾消費階段」與「超越大眾消費階段」等六個階段。台灣在過去 60 年的經濟發展已經走過了前面四個階段，目前已經進入大眾消費的第五個階段，並且逐漸朝向第六個階段，也就是「超越大眾消費階段」。相對而言，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在 1990 年代已經進入第三階段「起飛階段」，正如圖一所顯示，而準備邁向第四階段「走向成熟階段」，轉向高附加價值的資本密集產業、完成交通與通訊等基礎建設。也就是，未來一、二十年之內，中國的市場經濟將愈趨成熟，國民所得也可望以高角度持續成長，而開創大眾消費的時代。中國未來經濟成長的軌跡，如果沒有重大意外，也將和台灣過去 30 年的成長軌跡有所類似（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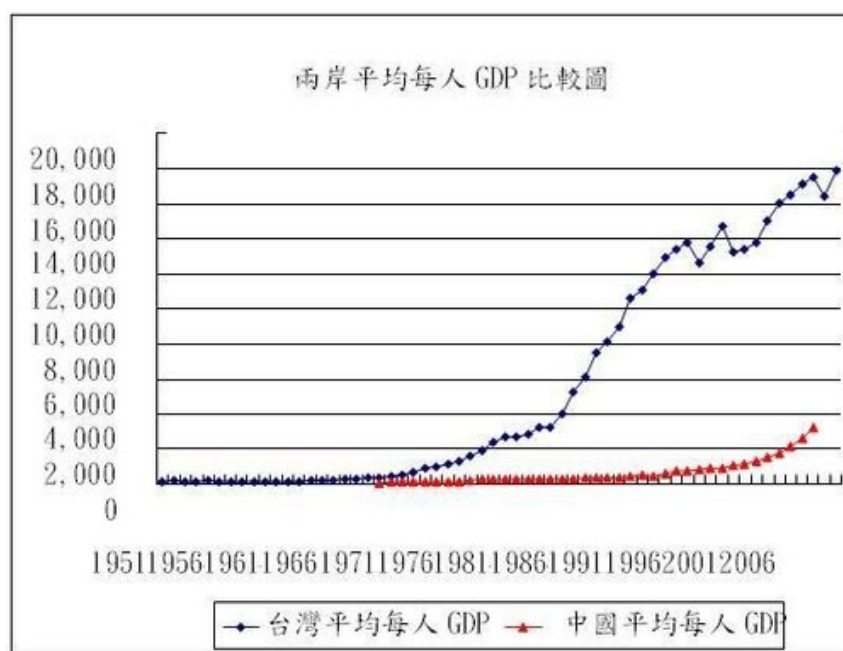


圖 2 兩岸平均每人 GDP 成長比較圖

台灣在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排名上，2010 年為第 13 名，處於二到三期的轉型期（Transition 2-3）的競爭力發展階段，也就是處於效率驅動期和創新驅動期的中間階段。相對於中國總體市場規模第 2 名、總體經濟表現第 4 名的突出情況，台灣最主要的特點則在於，創新排名第 7 名。在世界經濟論壇所採用的競爭力十二項支柱中，台灣其他項目的排名分別為：健康和初級教育第 11 名（中國：37），高等教育和訓練第 11 名（60），商業精緻第 13 名（41），貨品市場效率第 15 名（43），基礎建設第 16 名（50），科際整備第 20 名（78），勞動市場效率第 34 名（38），制度第 35 名（49），金融市場發展第 35 名（57）。如果就評比的細部項目而言，台灣在以下的項目排名都在前 13 名之內：當地競爭的密度第 1 名，每百萬人專利數第 1 名，電話線第 1 名，金融服務的價格第 2 名，工資和生產力第 3 名，群聚發展的狀態第 3 名，市場優勢的程度第 4 名，地區性資產市場的融資第 4 名，當地供應商的數量第 4 名，高等教育入學率第 5 名，買家的挑剔第 5 名，數學科學教育品質第 6 名，政府決策透明度第 7 名，高階科技產品的政府採購第 7 名，通貨膨脹第 7 名，顧客導向的程度第 8 名，學校網路普及度第 8 名，科學家和工程師的供應第 8 名，鐵路基礎建設品質第 8 名，公司研發經費第 9 名，初級教育品質第 10 名，廠商層次的科技接受性第 10 名，當地供應商的品質第 11 名，大學產業界合作研發第 12 名。從這些競爭力領先的項目來看，台灣整體的世界競爭力是建基於各級教育的質量均佳、充滿優勢的市場經濟因素，包括競爭性的金融服務價格、工資和生產力、產業群聚現象、以及挑剔的買家。台灣的私部門重視研發工作、隨時擁抱高科技、製造廠商追求高品質，這些因素都使台灣的私部門在各項國際競爭力評比中，長期名列前茅。從歷史脈絡來看，台灣私部門的競爭力優勢，如果能夠配合公部門競爭力的提升，將形成效果明顯的良性循環。

台灣在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排名上，2010 年為第 13 名。但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所公佈 2010 年全球競爭力排名，台灣驟升 15 名，

成為第 8 名，且首度擠入前 10 強。當時 IMD 世界競爭力中心副主任蘿思蕾（Suzanne Rosselet）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我在全球從未看過排名由 23 名躍升至第 8 名，這令人太不可思議」。然而，更令人矚目的是，台灣在 2011 年 IMD 評比的 59 個國家與經濟體中，排名第 6，是從 1997 年評比開始的 15 年來，名次最高的一次（見表 1，圖片來自天下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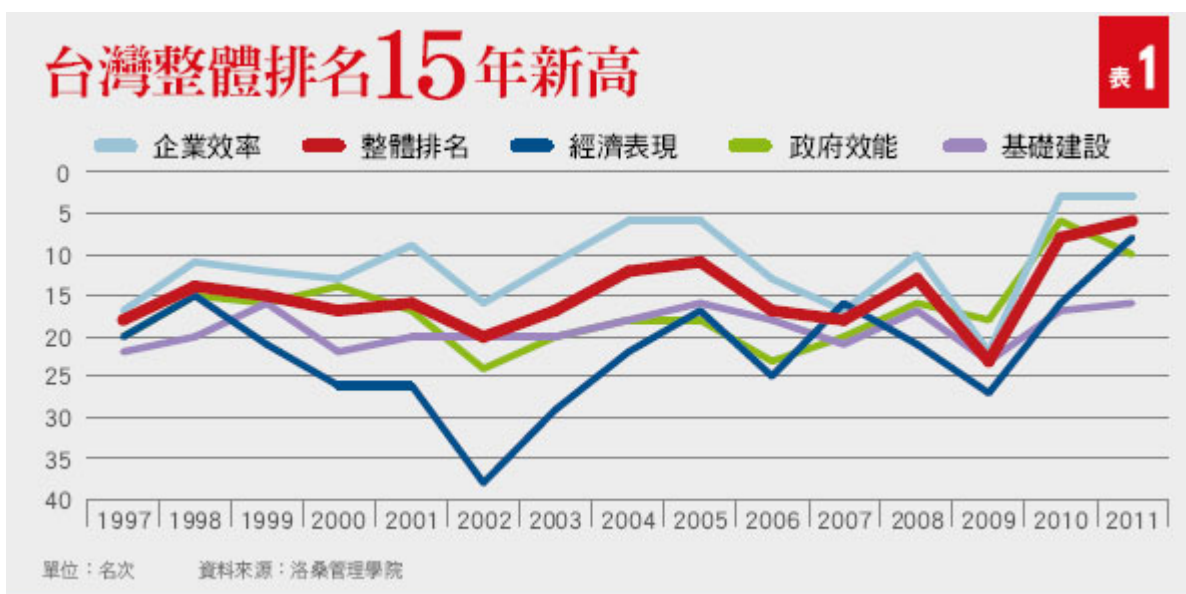


表 1 台灣全球競爭力排名

IMD 競爭力排名，分析評量各經濟體運用各項能力，達到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的目標，主要分為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率、基礎建設 4 大面向，其共有 20 大類指標。從這 4 大面向的成績來看，明顯可以看出，台灣備受推崇的企業競爭力更上一層樓，而政府效能相對依然落後。最讓人擔憂的是，對於社會公平與未來競爭基礎的投資更是不足。

羅斯蕾並指出，與中國大陸簽訂 ECFA，的確是提升台灣經濟表現的一大因素。從投資、出口、貿易佔 GDP 的比重、觀光這些評比項目的成長，都可以看出其效果。此外，ECFA 還有間接心理影響，讓大家覺得台灣的不確定因素降低。4 大面向中，今年唯一整體倒退的，就是政府效能，比去年退步四名到第 10 名。整體上來看，IMD 評比下，台灣競爭力排名在前 10 名的項目包括：生產力與效率第 3 名，管理能力第 3 名，財政政策第 4 名，態度與價值觀第 4 名，國內經濟第 5 名，國際貿易第 5 名，科

技基礎第 6 名，科學基礎第 7 名，勞動市場第 7 名。大致上比較 WEF 和 IMD 評比項目中，台灣比較基於領先地位的項目是相同的，比較重大的差異則存在於 IMD 對於台灣的教育排名比較落後，只有第 25 名（參見表 2，圖片來自天下雜誌）。



表 2 台灣各項競爭力排名

各國競爭力的基礎不外來自於基礎建設的水準和人民教育水準，其中的細項包括醫療基礎建設、醫療支出、能源強度（energy intensity）、碳排放量、生活品質等，以及教育投資、科學教育等項目都是 21 世紀國際競爭的重點項目。台灣如何在這些項目上取得更佳戰略地位，將決定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另外，從經濟、社會面來看，台灣的所得分配在過去幾年內也有惡化的趨勢。由於社會福利政策在最近一、二十年才開始積極推動，台灣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雖高於 OECD 高社會福利支出的國家，但較新加坡、日本、南韓及美國為低或相近，低於國際警戒線，變動趨勢也相對穩定。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產業外移中國的確對勞動市場產生相當的影響，從而影響到受雇人員的勞動報酬在近 10 年來甚少調整。就業結構的改變連帶影響了所得面，低技術勞工薪資與高技術勞工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且企業在中國的盈餘大多繼續留在中國投資，並未分給受雇員工，也使所得結構與分配更進一步受到影響。

肆、21 世紀國際的挑戰性重大議題

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基本上取決於國際環境和國際之間的動態發展與比較。整個 20 世紀下半葉，國際環境變動的情勢越來越快速而緊張。透過全球科技和交通建設的推動，全球化的腳步呈現日新月異的現象。舉例而言，軟體科技領先而席捲全球的蘋果 iPhone 智慧型手機，自 2007 年問世以來，今年將推出第五代的產品。科技產品推出的速度和更新的速度，基本上是以年和月為計算的基礎，而絕非 20 世紀以 10 年、20 年為一般產品更新的頻率。因此，國際競爭力的評比和排名也將充分反映各國之間政經情勢努力改革的痕跡，也會反映劇烈變動國際環境下，經濟體質突然變弱所造成的重大後果，愛爾蘭最近 20 年間由盛轉衰，對於國際競爭力的跨國競爭和啟示，是不容忽視的教訓。

整體而言，21 世紀國際間的挑戰性重大議題包括以下各項：

第一，全球暖化危機。2007 年 2 月，跨國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PCC）的科學家發表眾所矚目的全球暖化危機報告，指出全球氣候變遷的徵兆包括：冰河融化、春天提早來臨、氣溫上升。在前 12 年中，有 11 年的氣溫屬於地球最熱的年份。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雖然特別針對二氧化碳的排放發出警告，不過，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美國，都極力淡化氣候變遷對自然生態的影響。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在使用煤、石油，以及因為使用能源所產生的污染、溫室氣體，也就快速成長。目前中國大陸能源消耗總量已經超過美國，對於全球暖化的影響將越來越大，也會受到世界各國更大的壓力。

第二，世界各國赤字擴大所造成財政危機或支出萎縮，將衝擊世界經濟。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在各國採取緊急措施努力搶救之下，總算轉危為安，使全球經濟走向復甦之路。然而，在搶救世界經濟危機之中，各國政府投入相當龐大數量的寬鬆貨幣到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到目前為止，歐洲的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仍然沒有脫離經濟危機的陰影，各國年輕人失業的情況也不斷擴大。美國則仍然處於經濟復甦微弱，

國債達到 14 兆美元的歷史紀錄。如果美國總統和國會不能夠在 8 月 2 日達成協議，美國國債勢必將超過 14.3 兆美元的法定上限。在此同時，美國還沒有財政資金為後盾的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隱藏負債更高達 110 兆美元。

英國的財政危機持續擴大，英國政府在 2010 年 10 月宣佈今後幾年政府將削減 830 億英鎊財政預算。這項計畫被稱為英國政府二戰後推行的最嚴厲的緊縮政策，除政府各部門經費大幅削減外，社會福利開支也被削減 70 億英鎊。除了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具有相對財政健全性以外，其它的歐美國家都籠罩在國債高漲、財政赤字不斷過大、經濟難以復甦的惡性循環。這種情形對於中國經濟成長在過去 30 年中主要仰賴歐美市場進行出口貿易，形成嚴重的威脅。

第三，先進國家財政負擔龐大的主因，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退休金基金的缺口。20 世紀下半葉開始，人類平均壽命不斷增加，相對於各國公部門退休年齡並未因應提高，而通常透過預算來支應公務人員的退休，於是逐漸形成重大的財政負擔，甚至於更演變成缺乏財政基礎、但快速膨脹的實質國債。就歐美先進國家而言，社會人口老年化、國民年金負擔日益沉重、公務員退休基金造成財政困境的重大趨勢，也為未來的世界經濟投下陰影。

伍、兩岸競爭力互補的策略

中國過去 30 年經濟快速成長的成果是，不但基本上解決了 13 億人口的生活問題，同時開創了東南半壁上億以上人口進入市場經濟，成為中產階級，並逐漸走向市場經濟的成熟階段。展望未來，在一、二十年之內，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國、最大的經濟體、擁有最多的外匯存底、最大的消費國、為數眾多全球商品的第 1 名生產國。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將如何與美國共同承擔「G2」新情勢的世界責任，成為負責任的領導者。

由於中國人口高達美國的四倍，在快速經濟成長和外銷導向的經濟計劃下，能源消費總量已經超過美國，並且佔到世界總量的 20%，但經濟總

量則僅為美國的 37%，因此未來採取新的能源政策，加速開發與運用石化產品以外之能源，已經是必然的政策選擇。中國將來在能源政策、另類能源開發的研究、發展、和運用上的努力，不但將強烈影響未來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將對全球暖化的情勢，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在政治與社會方面，中國採行共產主義的市場經濟，在一個世代之內，達到基本滿足生存需求、創造人口眾多的中產階級、快速形成為數龐大的城市化發展，其所得到的成果和未來所面臨的挑戰，都是人類前所未見的局勢。中國領導階層在未來的世代中，一方面必須不斷開創新的經濟情勢，另一方面也必須摸索政治和社會轉型的發展途徑，以妥善處理未來因為人力結構質量轉變，必然來臨的老年化社會，及其所帶來的各種社會福利挑戰。

相對地，台灣透過 60 年經濟發展的經驗和實力，而得以在政治上逐漸學習西方民主社會的經驗，完成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設計，以及實際上體驗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從不同的世界競爭力評比機構對於台灣的肯定，已經明顯看出，台灣的經濟體質和法律制度，已經趨於高度發展和成熟穩定。台灣未來努力的方向，和進一步成長的重點，不但是與世界接軌，也必然將與中國的發展緊密互動。因此，兩岸政府與人民如何進行競爭互補，迎接未來的各項挑戰，是必須預為規劃的課題。

承接本文所分析的兩岸各自擁有的強項和弱項，台灣的強項在於經濟發展方面的制度設計，已經高度符合通行的世界市場經濟標準。在經濟制度運作上是多元民意反映、清楚、完整、透明的市場經濟和私有經濟。在法律制度上已經建立國際水準的法律制定架構、解釋架構、與申訴、審判架構，並且形成全民在法治社會方面的共同信念和實踐。台灣在政治方面經過 60 年的學習和努力，已經形成民主政治的堅實基礎，透過選舉政治、民意政治、法治政治、以及公民社會的強烈信念，從而和經濟、社會發展互相結合，完成民主政治的轉型，達到全面的鞏固。

未來兩岸競爭力的提升方面，本文認為，台灣 60 年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經驗，基本上反映了 1940 年代政府遷移台灣之後，大陸各地區的精英、代表人士也都來到台灣，共同和台灣原住民、移民，創造了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成就。大陸能夠參考台灣在各方面發展的歷練和經驗，就正如 30 年來，台灣曾經提供有關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等經濟發展策略給中國大陸參考，從而開創各種經濟特區的歷程，將台灣視為前驅、實驗場，或者合作成為產品、服務的測水溫實驗基地，都可以產生重大的經濟效益。國際跨國公司，特別是高科技產品公司，目前都將台灣視為新夫婦研發產品的首銷地區，其理由也都因為台灣市場腹地狹小、人口集中、使用者知識水準高、使用者要求程度高，新產品是否能夠熱賣，台灣是一個非常適合當做試銷的市場。同樣的，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軌道，也融合了西方多元文化的特性，以及在地文化的不斷衝擊。台灣經過 60 年的政治發展，才形成今天民主法治社會的全民共識。

本文基於以上兩岸各自發展的歷史軌跡和成果，並考量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綜合特性，提出以下競爭、互補的策略內容。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後，逐漸將從世界工場轉變成為世界市場，並且在各種世界舞台取得領導地位。然而世界各國要進入中國市場，顯然將面對眾多的潛規則與文化障礙，甚至於歷史障礙。正如 IMD 院長威爾斯(John R. Wells) 教授曾表示，台灣可做為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機會之門，加上台灣與中國大陸有相同的文化背景，這是台灣的優勢。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內容豐富，做為世界旅遊產業的寶庫，其發展潛力絕非觀察目前的發展現況所能進行線性推導。另一方面來看，台灣擁有中華文化的經典寶藏，如故宮，不但有中華文化的美食經驗，更融合了世界各國的美食經典，提供全世界觀光旅遊的最佳景點和生活經驗。因此，台灣可做為未來中國大陸旅遊市場的敲門磚，長期做為中華文化人文生活的領先櫥窗，並與大陸的旅遊市場形成互相搭配的關係。

兩岸國際經濟競爭的情勢，在大陸經濟總體規模將成為世界冠軍的局勢下，台灣所遭受到的壓力將越來越為沈重。從正面來看，台商在大陸的發展，領先群的企業已經取得重大成就，並且在大陸各省都奠定良好的基礎，尤其民生產業方面建立良好的口碑。但是，就台灣的整體經濟發展而言，除了台商在大陸的發展外，競爭策略則必須朝向優勢重點競爭和創造華人社會的文化生活櫥窗。台灣需透過優勢重點競爭，取得關鍵性產業在全球的優勢地位。以瑞士為例，瑞士和台灣都是天然資源並不充沛的國家，但瑞士投資培育人才，投資高價值服務產業像是旅遊觀光業等，瑞士的經濟發展仍然贏得世人的尊重。台灣也有很多的機會可創新並多樣化高價值的服務產業。另一方面，台灣可透過華人社會文化生活櫥窗的優勢地位，提供文化、生活、創意產業的就業機會。

台灣在上個世紀經濟發展的最大優點就是中小企業眾多，活力充沛，在全世界攻城掠地，取得重大成果。然而，1980年代以來，全世界開發中國家紛紛透過加工出口區的經濟開發管道，從事出口產業的低價競爭，台灣中小企業的優勢因此必須從代工製造轉變為取得創新優勢。縱然在看來科技含量比較低的紡織業，也必須強化科技創新，提高競爭優勢，並創造更大的營收利潤。就大型產業而言，台灣科技產業也必須跳脫跟隨模仿的「老二主義」，轉而採取追求第一的策略，才有未來進一步成長的空間。但是，要做特定產業的領導者除了需要積極創新之外，還必須要投入極多的資源。在台灣中小企業為主導的經濟體制下要能以小博大，就必須要採取集中力量以優勢兵力單點突破的策略，先求在利基的區隔市場求勝，然後才能考慮擴大戰線。以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為首的半導體產業在人力資源總量上不具有競爭優勢，但是，集中資源專攻晶圓代工的區隔市場，最終將最佳的科技人才投入在這一領域，所以才成就晶圓代工產業台灣為世界第一的地位。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來，台灣未來的首要挑戰，就是培養世界一流的人才與強化創新性研發。

未來在經濟產業發展上，兩岸如何探討出競爭互補的產業關係，在尊重市場次序的原則下，又能對於未來的產業分工與開拓全球市場有所幫助，是兩岸互補關係的重要課題。

本文最後基於以上的描述和論述，透過表 3 扼要提出兩岸未來在競爭、互補關係上，可以共同思考、協商、實踐的具體事項。相信透過兩岸更密切的互動與探討，兩岸競爭、互補的關係，將更為明朗，而最終能共同創造華人社會的楷模範例。

表 3 兩岸競爭互補之策略性項目

	需要強化的課題	對岸能夠提供的互補	對兩岸的效益
台灣	本地市場較小	開放大陸市場	調節市場供需，擴大規模經濟
	增加觀光客	開放觀光人口	促進兩岸觀光交流 提升台灣觀光環境與水準
	文創產業	傳統文化交流	強化台灣文創產業的傳統內涵
	文教產業	大陸學生來台	充分利用台灣高等教育的產業能量 大陸學生吸收台灣政治經濟成長的經驗 台灣學生接觸國際學生以外之外部經驗
	產業創新	大陸優秀人才來台工作	加速台灣產業創新之人力水準 加速兩岸產業創新之交流
	政府能力提升	政府人員交流	增加對大陸政經體制的理解 增加對台灣政經發展經驗的理解
大陸	產業升級	地理集中而挑剔的買家	台灣可做為高科技產品、服務的實驗市場
	醫療水準	完善優秀的醫療人才、設備、制度	改善醫療水準 改善醫病關係
	生活品質	環保經驗	提升大陸的環保水準 內化大陸人民的環保實踐
	環境保護	垃圾處理政策	垃圾減量，創造永續社會
	健康保險制度	全民健保的制度設計	建立大陸健康保險制度，改善醫療水準
	社會福利制度	國民年金制度	建立老年化社會保障制度
	民間互助與慈善水準	慈善機構與制度	提升大陸非營利組織慈善活動能量
	政治體系的改革	國民黨執政經驗 各級選舉經驗	有助於推動政治體系的規劃性改革
	政治廉潔度	防貪的經驗交流	有助於創造廉潔政府
政治與政府運作之公平與正義	民主化的經驗	提升政府職能 促進和諧社會	